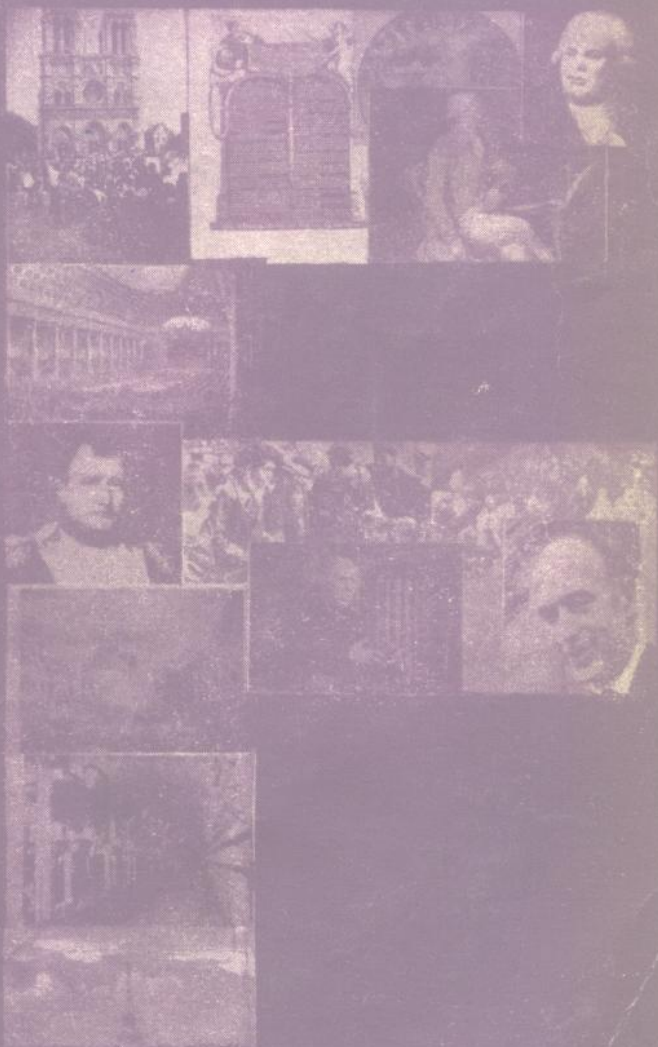


法国史论文集

中国法国
史研究会



法国史论文集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



生活·讀書·新知

书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968432

封面设计：王师颀

法国史论文集

FAGUOSH! LUNWENJI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75印张 282,000字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400

书号 11002·570 定价 1.20元

前 言

171309/18

法国史研究会从1978年筹备、1979年成立，到现在已经五年了。五年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鼓舞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支持下，在各高等院校的协助下，我们团结了全国法国史专业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一百余人，召开了四次学术讨论会，出版了六期《法国史通讯》。

这部论文集就是在上述点滴工作的基础上编辑起来的。除了个别论文曾在学术刊物上登载过以外，绝大多数都是首次发表的。少数几篇选自《法国史通讯》，这次重新发表前又经作者修改补充。

近代法国创造了高度的精神文明，有关近代法国的研究力量也相对集中，因此本文集有三分之二的论文是研讨法国近代史上的问题。同时，本文集还收入了关于古代法国和现代法国的几篇文章。我们希望本文集的编辑出版有助于推进法国史的研究。

值得高兴的是一批青年法国史研究者已经逐步成长起来。

本文集所收文章的观点，都是作者本人的见解，不代表研究会或出版单位。

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我们的研究水平还有待提高，论文集不足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法国史研究会

一九八三年三月

目 录

清末民初政论界对法国大革命的评议	北京大学	张芝联 (1)
法国革命史的研究在中国	中山大学	端木正 (15)
巴黎公社与中国	中国人民大学	陈叔平 (47)
恺撒征服前高卢的社会结构和雏形国家 ...	杭州大学	胡玉堂 (63)
雅各宾专政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地位 ...	北京师范大学	刘宗绪 (82)
试论丹东的宽容政策	杭州大学	楼均信 (104)
关于罗伯斯比尔评价的史学	华东师范大学	王养冲 (118)
论法国大革命中的君主立宪派	北京外交学院	高韵青 (141)
法国革命中的土地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姜 芃 (160)
论“自由、平等、博爱”	华东师范大学	陈崇武 (176)
十八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宝贵遗产	陕西师范大学	何汝璧 (196)
法国启蒙思想和 1789 年革命原则在尼罗河畔的传播 ——兼论拿破仑埃及改革及其结果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潘 光 (218)
复辟王朝时期的梯也尔	武汉大学法国问题研究所	刘文立 (235)
甘必大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确立过程中的作用	杭州大学	郑德弟 (249)
论 1848 年 2—6 月法国无产阶级思想的转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孙 娴 (265)

艾米尔·爱德——布朗基派的一位重要代表

- 北京大学 郭华榕 (280)
- 评拉法格的历史功绩 杭州大学 沈炼之 (296)
- 法俄同盟的形成——兼论现代史上的法苏关系
- 复旦大学 金重远 (313)
- 论 1940 年法国溃败的原因..... 杭州大学 戴成钧 (330)
- 论戴高乐主义..... 国际问题研究所 陈乐民 (347)
- 从战略全局看吉斯卡尔·德斯坦的“多极外交”
- 中央党校 李元明 (361)

清末民初政论界对法国大革命的评议^①

北京大学 张芝联

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它爆发的那天起，就在西欧政论界引起一场拥护和反对这次革命的大辩论^②。同样性质但激烈程度稍弱的争论，在法国革命发生后一百年，才在中国展开，在革命派和反革命派，在赞成自上而下的改良与自下而上的革命各派之间展开。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这场争论都不是纯学术性的，而是与各国国内政治紧密相关的。

中国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响之所以姗姗来迟，其原因是不难找到的。除了中法两国相隔万里这个地理因素之外，中华帝国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尚处在鼎盛时期的末尾，它的封建社会结构大体上还完整、稳固，在政治经济上它正处在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最后阶段。当雅各宾派对吉伦特派的斗争发展到白热化并取得胜利之际，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率领使团到达中国，觐见乾隆皇帝。英国提出的外交和商业要求一律遭到清政府的拒绝，理由是“天朝物产丰盛，无所不有”。即使法国革命的消息当时传到了中国，它也只会遭受士大夫的冷遇与斥责。

半个世纪之后，由于中国被迫开放，政治气候、社会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对外国的兴趣与日俱增。但是介绍西方历史知识的著

述仍很零碎贫乏，从魏源的《海国图志》(1842年)中叙述法国革命一节可见一斑。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王(路易十六——引者按)助亚墨里加战，胜，然其饷银渐减，故召爵、僧、民三品会集，以寻聚斂之法。国民弃王，杀之。七年国政混乱，有臣曰那波利稔(拿破仑——引者按)者，武功服众……。”③

此后几十年间，清王朝迅速衰微：列强入侵，农民起义，接踵而至，加上百年来人口激增，导致社会动荡，政治上层建筑基础动摇。于是在一部分开明官僚与知识界中出现赶上时代与了解世界的迫切要求。1871年王韬写成了我国第一部法国史：《法国志略》④。作者曾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游历英国、法国。对法国革命这一翻天覆地的重大事件，王韬有何感想呢？他在叙述1789至1795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后，以太史公和司马光的笔法加以评论说：

“共和之政，其为祸之烈至于斯欤？叛党恃其凶焰，敢于明目张胆而弑王，国法何在，天理安存！不几天地反覆，高卑易位，冠履倒置，纪纲紊乱乎哉？此与英国高门士(下议院——引者按)弑王查尔斯事相仿佛。古今悖乱之事，固未有甚于此者也。顾迹其祸之由来，不能和众而得民心，自恃居民之上而好恶不与民同，怨之所积，足以亡身。……法人弑王而叛党旋覆；英人弑王而高门士亦随灭。不独天道好还，亦可以观世变矣。然则为人君者，其可逞欲而妄为哉？”⑤

王韬笔下的法国革命犹如发生在古代中国的一次事变。作者明显地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谴责革命者犯了杀君大罪，违反了“国法”与“天理”，因此不然导致失败。同时，在分析这次“祸乱”的原因时，他又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君民同乐”、“与民同之”的传统政治理论，责怪国王“不能和众而得民心”，所以遭到“亡身”之灾，警告为人君者不可“逞欲而妄为”。王韬总结的这个历史教训和他的道义判断有相当的代表性，在后来其他人的著述中不断重

复出现。有意思的是，王韬的这种观点在法国当时一部分保皇派论著中也可以找到印证。^⑥

二

十九世纪八十、九十年代，中国面临更严重的民族危机，对日甲午战争的可耻失败激起朝野一片改革的呼声。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取得了光绪皇帝的信任，积极鼓吹自上而下的改革。康有为继承了以史为鉴的“资治”传统，运用了“洋为中用”的类比方法，从1897至1898年间，仓猝地编撰了五部外国历史著作进呈光绪，每部书前冠以一篇序言。这五部著作是：《日本明治变政考》（丁酉1897年12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戊戌1898年正月）、《突厥削弱记》（戊戌5月）、《法国革命记》（戊戌6月）、《波兰瓜分灭国记》（戊戌6月）。^⑦

资产阶级改良派对于1789年法国革命的最初观点，在康有为的《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表达得淋漓尽致。^⑧这篇一千字的序言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层对这次大变革的惊惧与谴责，对路易十六的同情与批评，也表达了对光绪皇帝的警告与谏诤。

康有为把法国革命描绘得恐怖万状，凄凄惨惨，他荒谬地夸大了革命过程中死亡的人数，对王室、贵族、富人寄以无限同情：

“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廿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十万之贵族，百万之富家，千万之中人，暴骨如莽，奔走流离，散逃异国，城市为墟，而革变频仍，迄无安息，……路易十六，君后同囚，并上断头之台。……”

然而，康有为对路易十六有褒也有贬。他说：“‘维命不于常’，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故有国者不能不慎。”他赞扬路易“开议院”，是“至仁”，“立宪法”是“至公”，让人民从凡尔赛宫“推至巴

黎”是“至宽”；同时指出：

“惜其许行立宪不尽出于己意而多由民迫，不刚断于速行，而游移于众议，始则恃瑞士之军，以兵为卫，既而散之，则无兵而同于匹夫矣。终则恃外援而出奔，遂激民怒而成大戮，身首异处，为天下笑。”

当康有为还是一个开明的改革者的时候，他承认君主不能“一人肆于民上”，一旦人民明白了“公天下”的道理，“则富贵崇高者众之所妒，事权尊一者众之所争。”民心大动，民情大变，到那时“昔之名分不足以定之，适足以激之；嚮(向)之权势不足以厌(压)之，适足以怒之”。何况“寡不敌众，私不敌公，……安有以一人而能敌亿兆国民哉？”国王应该“不待民之请求迫胁而与民公之”。可惜路易十六不能“审时刚断”，以致“身死国亡，为天下戮笑”。这是对光绪的暗示与警告。

在评论法国革命的影响时，康有为出于反对革命的目的，大肆咒骂“革命之祸遍于全欧，波及大地，……普天地杀戮变化之惨，未有若近世革命之祸酷者矣，盖自法肇之也。”另一方面，他又抱着改革的愿望，承认：

“近世万国行立宪之政，盖皆由法国革命而来。迹其乱祸，虽无道已甚，而时势所趋，民风所动，大波翻澜，回易大地，深可畏也。盖大地万千年之政变，未有宏巨若此者，亦可鉴也。”④

既可畏，又可鉴，这就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戊戌变法前夕对法国革命的总结。对他们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仿效日本进行自上而下的变革。但是事与愿违，几个月后“百日维新”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康有为不得不逃亡国外。随着义和团运动后革命浪潮的高涨，康有为的立场也逐渐从改良派转变为保守派、保皇派，他对法国革命的态度也更趋反动。

三

1901至1905年之间，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国内外继续活动，特别是流亡日本的革命派，痛心于维新运动失败的教训，更自觉地认识到用革命方式推翻清王朝的必要性。他们列举外国史例，特别是法国革命的经验作为佐证。邹容在《革命军》中大声疾呼：“我中国其革命！”他竭力推崇近代史上英国、美国和法国革命，誉之为“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⑩他以读到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以及《法国革命史》（作者不详）等著作为幸，特别把卢梭等人的作品视为“灵药”、“宝方”，甚至要“执卢梭诸大哲之宝旂，以招展于我神州土。”湖南杨笃生更是无保留地赞扬法国人民在多次革命中的暴力行动：

“臧独夫民贼之首，以徇于巴黎市，举国之人莫不为之拊髀雀跃，而呼自由万岁也。三逐其君，十四更其宪法，糜肉流血，如沸如羹，有地狱之悲焉，然卒为强国。不如是则法兰西必仍为奴隶国，不足以成今日之法兰西也。”^⑪

相反，资产阶级改良派则将法国革命描绘成一幅阴森的画面，企图以此证明，一旦人民参与了斗争，将施行极端手段，连革命中的温和分子也不能幸免。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是罗兰夫人的崇拜者，他在论述法国革命的早期著作《罗兰夫人传》中^⑫，称赞“十九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之人物不可不母罗兰夫人，十九世纪欧洲大陆一切之文明不可不母罗兰夫人。何以故？法国大革命为欧洲十九世纪之母故，罗兰夫人为法国大革命之母故。”但是他多次引用罗兰夫人临终遗言：“呜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借以嘲笑法国革命提倡的“自由”口号。在梁启超看来，革

命就是破坏,因为“人人不惧破坏,而破坏遂终不能免矣”。那么如何挽救这种既“难免”又“可惧”的“破坏”呢?梁启超俨然摆出一副仲裁人的姿态,提出如下的告诫:

“其在上位者,持保守主义者,当念民望之不可失,民怒之不可犯也如彼,苟其偷安苟且,弥缝掩饰,……则又必如法国一日中刑贵族王党千余人,乃至欲求为一田舍翁而不可得。其在下位者,持进取主义者,当念民气之既动而难静,民德之易涣而难结也如此,……悍然投其身其国于孤注一掷,则必有如法国当日互相屠杀,今日同志,明日仇讎,争趋私利,变成无政府之现象。”

换言之,他“天真”地希望君民双方都保持“节制”,上不压迫,下不革命,否则将大难临头。资产阶级改良派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歪曲历史,把革命与“屠杀”、“争趋私利”、“无政府”划了等号,企图以此恫吓一切革命者。

在另一部著作中^⑨,梁启超再一次以“旁观者”身份出现,报道两个爱国青年辩论法国大革命的得失,一个代表改良派,一个代表革命派。这场假设的争论以妥协而告终,但改良派制止“破坏”的观点显然占了上风。几年以后,梁启超公然以“开明专制论”的鼓吹者面貌出现了。^⑩

四

1905年,孙中山建立同盟会,它的机关报《民报》同年出版,从此中国革命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的思想理论斗争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关于振兴中华的宗旨、方向、道路、方法的激烈争论,促使辩论双方深入探讨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意义。

发出第一枪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年的维新派康有为。在流亡国外的年代里，他周游各大洲，他的立场已从改良派逐渐滑向保皇派。在多次游历法国后，他写成《法兰西游记》。此书的最后一部分题为《法国大革命记》，1906年以《法国革命史论》为题，署名“明夷”，刊载于改良派的机关报《新民丛报》^⑤。该文一发表，立即遭到寄生（汪东）的批判。^⑥接着寄生又在《民报》上连续发表同题长文《法国革命史论》，系统地驳斥康有为的论点。于是一场遭遇战发展成为正规战。

康有为反对法国革命（自然也包含反对酝酿中的中国革命）的论点较前又有发展。除了继续粗暴地攻击革命过程中的暴力行动外，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法国革命之所以招致“大乱”，是由于“妄执他国之验方，以望瘳己国之痼疾。”^⑦具体地说，康有为责备拉法耶特等人企图把美国的现成药方拿来医治法国的病，“而不审国势地形之迥异”，结果“在美行之而治，在法行之而乱也”。什么是美国的处方呢？概括地说就是“人民平等，主权在民，普通选举（即普选权）。”康有为承认这些都是“天下公理之至”，“至公至平之理”，但用之于法国则“未至其时”，“行之太速”，不“对病”。康有为既没有对美、法两国的国势地形进行细致分析与比较，也没有说明两国的“病”与“时”有什么不同，反而恶毒地攻击法国议员、官吏是“愚氓”，不识字，不能读法令，“犷悍横行无所不至”，诬蔑罗伯斯比尔、马拉、丹东、埃贝尔等革命者“皆以屠伯之性充法吏，故妄行杀戮，惨无天日”，以至“首创变法、倡始革命诸功人，莫不戮屠无遗种。”

为什么法国革命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康有为列举路易十六的六条错误，惋惜拉法耶特与杜木里埃“不早平乱党”，责备吉伦特党人的软弱和缺乏远见，“不虑事变，妄倡革命”。康有为不分析支配这些不同党派和人物的行动根源，而简单地以个人的好恶，“把历

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得胜者。”^⑩他说：“故当大变非常，仁柔之君子，必以犹豫不忍败；悍毒之奸雄，必以凶恶捷疾胜，此古今之故事也。”难道历史真是这样发展的吗？

康有为关于法国革命的论断充满偏见，矛盾百出。他一方面责怪法国人在条件不成熟——“不知学，不径教”的情况下仿效美国，“妄倡革命”，另一方面又用很多篇幅列举法国革命前封建制度的专横：“僧寺之贪横，税斂刑法之苛重，民困苦不聊生，其可骇可悲，实中国人所未梦想者也”。连梁启超也承认康有为论法国所以不得不革命之原因“最博深切明”^⑪；一方面咒骂山岳党领袖们“忍心”、“酷虐无道”，另一方面又承认“法国大革命之不亡其国也，抑幸罗伯卑尔、马喇诸屠伯悍贼之酷毒、绝无人理耳”，“若稍存人理，有一线不忍之心，则无以清内之异己，无以充内之兵食，无以聚内之猛士，即无以拒外之强敌，而法国必亡”^⑫；一方面诬蔑革命结果“一无所得”，只有“尽上断头台”，“合数十百万革命军之流血，以成就一罗伯卑尔之专制民主，合数千万良人之流血，以复归于一拿破仑之专制君主”，另一方面又肯定法国革命使“千年封建压制极恶之政借此尽灭去之，……旧日藩下之农工皆脱压制而得自由，贵民平民皆得平等，小民皆得有地，……此法人所日夜大呼，以无量英雄之血，购得之自由平等也。”

然而康有为的目的并不在于客观地评论法国革命，而是企图否定中国进行革命的历史与现实依据。他在《史论》中指出，法国人民经受的封建之苦，在中国都不存在：中国早废封建，实行薄税政策，税率比任何西方国家都低，法律统一，刑罚简轻，贵贱平等，人人可以经科举而当官。如果说革命，那么“我之大革命盖在秦世”；要说自由，“我之享自由盖自汉时”，“应大呼中国人在地球万国先获平等自由二千岁！”象法国那样的苛政，“大约在我中国三四

千年前，各土司之世间或有之。”康有为还慷慨激昂地说：“若使吾中国而有十万淫暴之诸侯，占国地三分有一专横之僧寺，举中国平民不得任权要之职，则鄙人必先奋笔焦唇而倡自由，攘臂荷戈而诛民贼。”不仅革命无必要，甚至立宪也有害。他说：“我中国平等自由已甚，与法全反，立宪之后恐更有加重征税、密增法律之事，吾恐革夙昔自由之命，而国人一切举动益不自由耳。”总之，康有为把倡导中国革命的人比作“安平无忧而服砒自毒，强健无病而引刀自割”，即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样，康有为连自己当年维新改革的主张也一概否定了。

康有为的反革命挑战理所当然地遭到革命派的痛斥。1907年1月，寄生发表《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④，作者一开始就指出康有为的出发点和立场的错误。研究中外古今的盛衰变化，应当“穷其本根，溯其源流”，决不可“刻舟求剑，胶柱而鼓瑟”，更不应“徇私见，逞臆说。”法国革命虽然“丧乱繁多”，但它“一洗旧弊，遂能祛虐政，均利权，卒达改革之首志，其功抑亦赫赫可观哉！”康有为的错误恰恰就在“不睹其功，而重科之罪”，主次不分，本末倒置。而造成这种错误的根源则是“其尊君之心理”，即保皇立场。在康有为看来，凡是拥护与支持王室的人都是忠诚的，反之则是不忠不诚；凡是主张君主立宪者都是“才智之士”，反之都是“无识之乱民”。但寄生认为，波旁王朝早已失去民心，路易十六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杀死国王的是人民（天“假手于吾民”）而不是被康有为诅咒的罗伯斯比尔等山岳党人。

寄生也不同意“妄执他国之验方以望瘳己国之痼疾”的论点，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效法美国”，而在于“效法之未尽善者”，即法国只采用一院制而没有采用两院制。“夫仅有上议院，此固贵族政治之变形，而仅有下议院，则又民权专制之实质”；如能“联合两院，互相调剂，以底于平”，那么少数“剽悍不仁之徒”也不能起什么作用。

何况“屠伯之性非人人然”，马拉、罗伯斯比尔等人也都是“英迈果断，有卓见者”，论学识则都“造诣甚深者”。寄生认为不能责备吉伦特党人“倡导革命”；如果说他们“有罪”的话，那么他们的“罪”在于“不歼罗伯卑尔党，坐失事机，以致两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寄生自己的政治倾向，他站在吉伦特党一边，反对山岳党人的“过激”行动。他认为在任何革命中，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凡革命一起，诸恶象随之不可逃避，若影之逐形，然此得曰倡革命者之所致？”

寄生更不同意康有为所谓的“专制保国”论，他认为法国之所以不亡，并非象康有为所说是由于罗伯斯比尔等人的“残酷虐杀”，而是因为大敌当前，“各党派皆舍私急公，一变而为爱国之防卫，……一来外侮，翕然却之。”使寄生最感愤慨的是，康有为竟发表中国久废“封建”，自由平等已二千年，提倡革命的人类于“无病而学呻”等等谬论。寄生指出：“此真病狂之言”。更可恶的是康有为“取法国革命之事，危言相吓，愈乎吾民方张锐进之气。”

继《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之后，寄生于1907—1908年之间，发表了《法国革命史论》一文^②。他说明：“述法国革命之旨，在与中国一一相较，使读者知金人之诬妄与革命之真理”，意欲借鉴法国“大鸣不平”（指革命）的经验，以促进中国“一鸣以惊人”。作者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抨击清朝的贵族专制制度；从经济、政治、法律、种族各个方面揭露满清入关以来的封建压迫，特别详尽地列举税役、刑罚之苛重，以驳斥康有为所标榜的中国一贯“薄税省刑”的谬论。中国人民的疾苦不仅“与法国等”，甚至有些压迫“万国皆无而独存于吾中国”。既然康有为承认法国革命前民不聊生，“此平等所由倡，自由之说所以起，革命所由生”；而中国老百姓遭受的淫暴压迫比之法国，有过之无不及，为什么他又“恶革命如鸩鸟猛虎、洪波巨焰”？寄生指出，除了在方法论上不能“统观其全”外，康有为的错误根源在于“夙夜经营，求厕身于庙堂之上，魂萦魄绕，天子之

知我用我耳。足不履阡陌，目不睹穷黎，习为谄誉，并忘其旧。”保皇的立场蒙蔽了他的眼睛，高高在上，不悉民间疾苦，惯于逢迎谄媚，连自己主张维新的历史都忘得一干二净。

寄生对于清朝封建统治的揭露和对康有为保皇派立场的批判，充分揭示了这场关于法国革命的大辩论的意义。它与其说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客观”和“科学”的评价，^⑤不如说反映了不同的政治派别对法国革命以及对二十世纪初中国国情的不同分析和估计。显然，当时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急于同清朝统治者携手妥协，为的是共同阻挡日益高涨的革命潮流。他们之所以反对法国大革命，还因为这次革命的方法很不合他们的口味。“这不仅仅是由于这次革命的‘可恶的’恐怖政策，而且还由于这次革命企图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走向极端。”^⑥这就足以说明康有为等人对法国革命的强烈仇视态度。还有一部分不太富裕的资产阶级，他们的利益将在上层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妥协中受到损害，因此他们同情法国革命，但又对人民力量怀有不同程度的恐惧，因此只愿接受吉伦特党人领导时期的革命，而对于雅各宾党人的恐怖统治则同样有反感。寄生所属的温和革命派就代表这个阶级的态度。^⑦

五

当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时，关于革命的争论很快就转化为革命的行动。1910年2月，《民报》发表汉民的论文，^⑧作者以法国三次革命（1789、1830、1848）为例，说明革命武装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作者认为：“政府未有不失其武力而肯降伏者，亦未有已失其武力而不倾覆者也。夫革命断无纯恃武力之理，而武力之为重则如此。”武装起义已提上日程。

但是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并没有结束关于法国革命的辩